

绿色共富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的再认识

庄贵阳¹, 王思博², 窦晓铭³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北京 100710;
2.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124;
3.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基于绿色共富视角, 再认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 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在绿色共富概念缘起及内涵阐释的基础上, 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的认知迭代和政策取向, 进而提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公平共享的基本路径。研究发现: 绿色共富是在绿色发展理念下, 由共同富裕衍生而来。在此视角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研究旨趣由生态产品生产消费向生态产品价值为谁实现等人本问题转变; 相应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制定由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经济优势转化, 向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公平共享机制转变。乡村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问题的共同焦点, 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公平共享的关键路径是, 在公有制基础上, 以集体经济主导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激励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以公平生态收益分配制度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充分共享。从而在生态产品生产与价值实现过程中保证村民利益, 增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乡村绿色共富的带动能力, 实现乡村绿色振兴。

关键词: 生态产品; 绿色共富;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3)09-0053-11

Reflection on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ZHUANG Guiyang¹, WANG Sibao², DOU Xiaoming³

- (1.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co-civil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3. Beijing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cognitive iteration and policy orientation of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and then proposes the basic path of fair sharing of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is derived from common prosperity under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focus on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has shifted from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o the question of who do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收稿日期: 2023-05-23 修回日期: 2023-06-25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生态文明范式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机制研究”(2023STSA01)。

作者简介: 庄贵阳(1969—), 男, 吉林榆树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通信作者: 王思博。

products realize for; Correspondingly,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ies for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has shifted from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economic advantages to improving the fair sharing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ural areas are the common focus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promoting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The key path to promote the fair sharing of the value of r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is to expand the reproduc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led by the collective economy, encourag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and promote the full sharing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hrough the fair ecological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nterests of villagers in the produc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process of ecological products, enhance the driving capacity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for rural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achieve rural green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product;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和重大原则,强调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二者相辅相成。最初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关注如何将“生态蛋糕”转变为“经济蛋糕”,被作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具备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属性。然而,其未能解决个体层面共同富裕问题,也未明确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纳入考量,使得公众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集体行动水平较低,生态产业可持续性也受到较大制约。在共同富裕理论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基础上,衍生出绿色共富目标,使得生态产品价值为谁实现等以人为本问题越发受到关注。绿色共富视角下,各界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由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原有认识向生态红利共享驱动个体共富的新认识迭代演变。绿色共富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要求建立“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社会格局。乡村地区生态资源数量庞大且较为完整,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区域,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民农村富裕是绿色共富的核心工作,即如何通过乡村地区优质丰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建立完善村民共建共治共享长效发展机制。为此,本文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认知迭代与政策取向梳理,提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公平共享的路径,为相关施政方针制定调整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中国在 2010 年印发的《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中,正式提出“生态产品”概念,其是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概念内涵、实现机制等方面。第一,就概念内涵而言。生态产品被理解为生态系统对人类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是由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共同作用而获得的劳动产品,涵盖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气候和宜居的生态环境等无形或有形的生态要素^[1],一般被划分为物质产品、调节服务产品与文化旅游产品共 3 类^[2]。生态产品价值则需要基于生态产品实物量与功能量核算,采用市场价值评估或非市场价值方法,引入价格作为权重因子,进行评估^[3];第二,就价值实现而言。生态产品供给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但囿于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完善,加之政府财政主导生态补偿的支付能力有限,只有小部分的生态产品价值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变现为货币收入,属于直接经济价值。绝大部分生态产品价值不易通过市场机制直接实现,需要借助生态补偿等措施,以公共服务形式改善生态福祉、惠及公众,属于间接经济价值^[4-5]。有学者提出应从政府管制、产权制度、生态技术和生态市场四个方面着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的一般实现路径^[6],同时论证区域优势转化与生态财富形成资本循环的底层逻辑^[7],从而加快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向转化通道,促使良好的生态优势转变成为发展优势。这使得生态保护者权益得到保障、生

态受益者义务得到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者付出代价,增强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作。

绿色发展不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外生条件,而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8]。共同富裕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而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平紧密相关,绿色逐渐成为共同富裕的鲜明底色,绿色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理应纳入共同富裕框架,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驱动力量^[9]。目前,已有学者从财富生产、财富分配和财富观重建3个方面,阐明“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以显明走绿色共富之路的必要性^[10]。在绿色共富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再仅是协调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战略,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产、交换、消费问题研究基础上,开始关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利益分配的合理性^[11]。社会管理者身份赋予了政府公共权力,政府应承担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监督管理等职能^[12],生态产品价值为谁实现人本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尤其对于占国土总面积90%以上、生态资源规模最为庞大的乡村地区而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其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在促进乡村绿色共富过程中,不仅需要盘活乡村沉睡的生态资源,促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做大经济蛋糕,更需要重视生态收入公平分配问题,提升地区整体福利^[13-14]。只有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依托良好生态本底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关注生态产业发展过程中村民权益保障,才能畅通拓宽“两山”双向转化通道,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个体增收,从而充分发挥乡村生态禀赋优势,实现乡村绿色共富的目标^[15]。

综上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带动乡村绿色共富相关研究已经逐渐得到学者关注,但研究刚刚起步,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①就概念内涵认识而言。学者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认识多限于市场化、货币化,对其主要的公共属性认识不足,并多停留在生产消费环节,缺少对公平分配的关注,需要在绿色共富视角下,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更为全面系统性地再认识。②就政策实践

演变取向而言,现有研究多选择以共同富裕为起点,论证绿色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较少文献涉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实践演变的绿色共富取向的思考,以致无法准确理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内涵对绿色发展理念的政策关切与实践取向。③就作用机制而言,现有文献多论证生态产品通过价值实现,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然而,区域协调发展并不能解决个体层面绿色共富的根本问题,导致生态产品为谁实现的问题悬而未决。尤其在乡村地区,村民作为绿色共富的主体地位无法得到保障。鉴于此,本文在对绿色共富概念缘起及内涵阐释的基础上,探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认知迭代和政策取向。由于乡村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问题的关键着眼点,本文聚焦于乡村地区讨论生态产品共建共治共享的路径,为绿色共富目标实现构建有效的保障机制。

二、绿色共富概念缘起及生态产品价值认识嬗变

绿色发展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要求,更是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方向。基于绿色共富视角,生态产品价值为谁实现的问题越发获得各界关注,从而推动生态产品认知嬗变,使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研究重心由生产消费向公平分配机制构建转变,进而能够更为全面系统性地再认识生态产品价值内涵。

(一)绿色共富概念缘起及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6]。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主要任务,其内涵得到更为全面的丰富与发展,实践重心随之由区域层面协调发展向个体层面共同富裕转变,既要缩小区域、行业、个体间贫富差距,也要推动经济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共同富裕也不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而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平紧密相关,绿色逐渐成为共同富裕的鲜明底色。由此,在共同富裕理论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基础上,衍生出绿色共富目标。

共同富裕一般需要从“富裕”与“共享”两个层

面理解。富裕包括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富裕,一般而言,只有每个人物质富裕达到较高水平,才会有更大的获得感、幸福感,物质富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精神富裕^[17]。共享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能两极分化,而是指区域、行业、个体合理的、有差别的共享收入、财产和平等地获得公共服务^[18]。绿色共富在传统认知基础上,丰富与发展共同富裕内涵,体现在以下是 4 个方面。

首先,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共富的前提条件。人与自然共同富裕是人与人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也是绿色共富的首要逻辑^[19]。绿色共富目标的实现,需要摆脱对工业文明范式下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路径依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系统性变革,探索在生态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绿色发展,是绿色共富的前提条件,各界只有通过有序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产业结构以及空间布局的绿色低碳转型,才能够突破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不可持续的桎梏,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飞跃式提升,增强全体人民共富的可持续性。

其次,绿色低碳是绿色共富的鲜明特征。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我国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绿色共富的福祉函数,不仅包含物质、精神层面,也将生态环境质量及服务纳入考量,生态改善是福祉提升的重要方面。生态环境质量及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公众身心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于宏观大尺度国土生态空间规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改善修复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福祉极大提升,使得绿色低碳成为绿色共富的鲜明特征。

再次,“两山”转化是绿色共富的生动实践。绿色共富不仅具备社会生产力持续提升与生态福祉改善的内在要求,也蕴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良好的生态产品供给,不仅能够通过改善一

般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效率,也能够通过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转化的通道,创新财富积累的生态路径,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财富的新增长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生动诠释绿色共富的科学内涵,也是绿色共富提出的重要实践依据。

最后,公平分配是绿色共富的保障机制。共同富裕的实现既有赖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有赖于各利益方的协同与再均衡。绿色共富需要转换到绿色发展的赛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绿色共富目标实现的关键途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投入可分为维护自然资本、增加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人造资本、增加生态产品经营管理的人力资本 3 个方面,对应的投入主体分别为个体、集体、社会资本,三者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而言缺一不可。然而,生态产品价值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只有保护个体利益,保障社会资本合理收益,兼顾集体福祉,防止“搭便车”式坐享其成,促进收益公平分配,才能使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个体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充分收敛,从而增强公众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极性,为绿色共富目标实现构建有效的保障机制。

(二)绿色共富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认知迭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的共同追求与联结纽带,两者存在明显的逻辑关联。公平分配作为绿色共富的重要保障机制,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认知迭代,引申出生态产品价值为什么生产以及为谁实现等人本问题。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需要基于不同视域尺度,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本内涵、主要任务以及关注重点再辨析与认识。

生态产品生产活动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如图 1 所示。结合实践分析,可以划分为超大宏观、宏中观与微观 3 个层面。在超大宏观层面,生态产品生产活动表现为各国按照“共区”原则开展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生态治理合作。在宏中观层面,生态产品生产活动表现为省际及省内地市级生态国土规划,及局域性生态环境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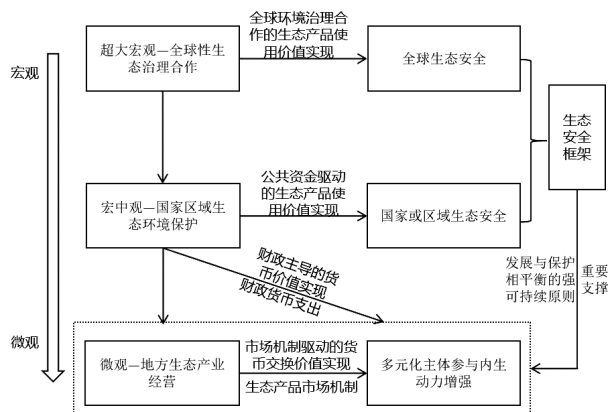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的空间视域尺度下生态产品特征表现

量改善。在微观视域层面,生态产品生产活动表现为,市场机制下,社会资本参与的生态价值补偿、生态权益交易过程中货币循环,以此增强民众参与生态劳动的内生激励,降低局域内所有微观个体单位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双重目标协同实现。生态产品主要用于修复维系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一般生产条件,决定其供给动机并非迎合市场需求,而在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属于普遍社会共同性需求特征,具有强公共属性。除公共物品这一核心属性之外,生态产品还包括准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及私有物品等各种属性,随着公共物品属性减弱、私有物品属性增强、市场化程度提高,重要性也依次降低。

相应地,生态产品价值在不同的空间视域尺度下表现也有所不同。超大宏观、宏中观视域下,生态产品价值表现为生态环境改善的使用价值,从而直接增进人类福祉,具有强公共属性。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支付能力有限,为使得生态劳动者获得合理报酬以及充分激励,需要基于超大宏观、宏中观视域下构建的生态安全框架,在微观视域推动生态市场构建。具体而言,政府作为代理人,在集体经济主导下,引导资本有序参与,构建有效分配制度,保障劳动权益,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优势,遵循节约劳动的首要规律,推动生态产业发展壮大。生态产品通过全球环境治理合作或公共资金驱动,实现改善环境的使用价值,通过财政支出或市场机制驱动,

实现货币形态的价值。总体而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并非局限于货币形态的狭义理解,还应包括生态福祉改善价值的广义理解。生态产品绝大部分价值体现在其通过改善一般生产生活环境、提升自然生产力、促进民众身心健康,从而产生公益性使用价值。小部分表现为货币价值形式,需要通过国家财政主导生态补偿机制或市场交易下资本循环机制,增强多元化主体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生动力。虽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较强公共属性,但其货币形态价值实现是相关实践长期关注的焦点。

绿色共富蕴含人本逻辑,即绿色共富既需要依靠人的发展,最终也是为了人的发展。人本逻辑将人的发展,从手段、要素的定位转变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发展依靠人民,一切发展为了人民^[20]。基于绿色共富视角,公平分配问题越发受到各界关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旨趣正由生态产品生产消费向生态产品价值为谁实现等人本问题转变,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重心正由“生态蛋糕”生产及其与“经济蛋糕”相互转化,向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公平分享机制,合理分配“生态蛋糕”的经济红利转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使“生态蛋糕”生产和“经济蛋糕”分配有机结合起来,使得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从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中受益,推动生态优势向共富优势转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一般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的生态溢价由当地政府和居民共享,当地居民除了获得劳动的收益外,也获得自然资源溢价的收益,从而为缩小个体层面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打开新通道。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恪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宗旨,通过激励生态环境保护行为,引导资本有序参与,从而保障人民根本权益,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身心健康、实现小康、共同富裕等目标协同实现。

同样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研究,亦经历做大“生态蛋糕”、转变“生态蛋糕”、向分配“经济蛋糕”的转变过程。首先,做大“生态蛋糕”。一般而言农村自然生态系统相对完整,为区域发

展提供生态支撑,乡村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修复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巩固做大“生态蛋糕”,提高乡村居民生态福祉,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生态支撑;其次,转变“生态蛋糕”。政府借助文旅产业、绿色农业、平台经济等,将绿水青山转换为乡村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能够引导社会资源向乡村汇聚,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有利契机;最后,分配“经济蛋糕”。生态产业是支撑乡村发展的主要路径,但囿于乡村自身可调动的资源有限,其在推进生态富民建设中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引领带动作用。绿色共富的基本内涵就是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既依赖于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有赖于各利益方均衡协调^[21]。虽然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经营开发机制不健全,村民共建共治共享水平较低,村民只能获得微薄的劳动和土地转让收益,无法参与生态产业经营性收入以及土地溢价分红,社会资本占有大部分经济收益,也无法充分共享生态产业发展的红利。不仅会导致个体富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也会导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区域协调发展与群体(个体)共富是不同的共富目标,两者有关联。区域协调发展是个体共富的前提基础,但区域协调发展属于宏观层面战略问题,而个体共富属于微观层面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设计问题,以 GDP 衡量的区域协调发展并不必然导向个体共富。因此,推动乡村生态产品的共建共治共享是探索乡村个体层面绿色共富的关键。政府只有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与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工作有机衔接,并重视完善生态蛋糕红利的分配机制,让村民得到合理回报,才能促进乡村绿色振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实现乡村绿色共富的重要着力点。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实践演变的绿色共富取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提出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和实践性,涉及价值生产、转化及分配。其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打造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新方案的理论基石,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绿色引擎。因而,有必要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相关发展的实际情况,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制定与实践探索演变视角,揭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共富内在关联的现实依据,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绿色共富的相关政策制定奠定实践认识的基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实践的演变历程如下:

(一)生态系统保值增值的政策实践阶段

2010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首次提出“生态产品”概念^[22]。生态产品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产品,与工业品、农产品并列。此时,生态产品相关政策聚焦于生态产品保值增值,提出如下措施:首先,重点生态功能区可适度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的产业,上级单位在此类区域落实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其次,通过限制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水平,倒逼重点生态功能区摆脱工业文明传统发展范式,探索生态文明发展新范式;再次,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不仅限于重点生态功能区,逐渐成为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任务,被作为应对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措施,要求各地区谨慎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区域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联合国启动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中国也开始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生态产品被认为是能够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其主要实践形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主体功能区规划^[23]。显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局限于生态福祉增益,被等同于生态保护实践,使得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繁衍调节支持服务供给能力得到增强^[24]。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主要借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生态产品保值增值的相关实践单方面强调强公共属性的生态资产积累,未充分将货币资产纳入考量。

可见,在政策制定与实践探索初期,政府将生态产品完全等同于自然要素,主要依靠有限行政指令与公共资源等外生驱动力,权衡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此消彼长的关系。虽然生态产品保值增值政策措施对协调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相应地,生态产品保值增值实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由“为了金山银山,毁坏绿水青山带来污水秃山”向“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转变,进而提升生态产品供给水平。但由于各界未充分认识生态产品社会属性,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未能在生态资产与货币资产间建立转化机制,生态保护者无法获得经济激励,生态产品保值增值政策实践对绿色共富带动作用较为有限。

(二)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实现的政策实践阶段

201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首次正式提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即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自我造血功能和自身发展能力,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促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25]。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于2019年相继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等文件,明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在完善资源产权制度、城乡融合发展机制、自然保护地体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多元主体参与、价值核算方法、价格形成机制、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示范等具体措施^[26-27]。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相关部门为增强生态产品对绿色共富的带动能力,逐步探索公共财政主导生态补偿制度,探索打通生态资产向货币资产转化的通道。生态产品价值向货币价值转化逐渐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生态产品供给的内生激励。虽然我国先后建立覆盖森林、湿地、草原、海洋等多个领域的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据统计该项资金投入总额由2001年的24.7亿元上升至2020年的2000亿元^[28],但财政支付能力相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在的巨大提升空间仍相当有限,无法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成充分激励,也无法促使生态产品价值与货币价值间形成可持续的良性互促机制。

可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政策,主要以财政转

移支付探索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通道,并以货币收入提高劳动者参与生态产品生产的积极性,不仅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自我发展和造血能力,也筑牢宏观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虽然生态产品对促进区域协调绿色高质量发展能够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相应地,生态产品保值增值实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变。但“政府主导,财政出资”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存在补偿范围小、标准低、机制不完善等局限性,甚至难以弥补生态产品供给成本。同时,相关政策制定未充分考虑“为谁实现”的问题,导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个体共同富裕带动作用有限。

(三)生态产品价值公平共享的政策实践阶段

202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保障参与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的村民利益”等要求,强调保障人的权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过程中的重要性,引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相关政策重心由区域层面价值转化向个体层面价值分配演变。同时,为纾解政府主导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公共资源的压力,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培育生态产品市场经营开发主体”等要求^[29]。同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文件,也将“完善居民参与方式,建立持续性惠益分享机制”等作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着力点^[30]。

长期以来,虽然依赖行政命令与公共资源外生驱动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对筑牢生态安全基础作出巨大贡献,但囿于可调用的公共资源有限,导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绿色共富的带动能力受到较大程度制约。为此,中央政府引领公众探索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31],激活全社会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在动力。例如福建南平“森林生态银行”案例、海南省儋州市莲花山矿山生态修复及价值实现案例等。推动生态产

品价值分配实践,促使财富分配机制由经济单轨道向生态与经济双轨道演变,使得新财富分配机制兼具生态正义与经济效益,实现财富沿生态足迹逆向分享,提升公众对生态财富接纳与共享的水平。

可见,各界对生态产品认知由具有单纯自然属性的生态要素拓展为兼具自然与社会属性的生态劳动产品,强调人的劳动参与,既包括环境保护行为、产业生态化对生态环境增益,也包括基于自然要素经劳动加工产生的相关产品和服务,如生态康养、生态农业等,即生态产业化。同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重心由区域层面协同发展向个体层面共富转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演变具有清晰的绿色共富指向。相应地,社会各界在宏观财政转移支付构筑的生态安全基础上,不断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分配实践,实现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向“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转变,使得从事生态产业劳动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报酬,生态产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壮大。

总体而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政策实践经历保值增值、价值转化、价值分配等阶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不断与区域协同发展、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有机融合,政策实践发展显现出绿色共富演变取向,对个体层面共同富裕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四、绿色共富视角下生态产品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探索

农村自然生态系统相对完整,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生态支撑。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乡村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关注的焦点。乡村急需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财富积累生态维度通道,实现财富沿生态足迹逆向共享。其中,绿色共富逐渐成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的重心。然而,乡村土地承包权被村民分散所有,村民个体拥有土地规模小,缺乏运营管理经验、必要资本储备,并且村民内部对于如何使用支配土地协商一致的成本较高,难以形成利益共融,以致集体行动能力较弱。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政策设计,社会资本投资

很可能削弱村民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得项目开发主要服务于资本增殖,偏离提升社会福祉的初衷,失去对乡村绿色共富的带动作用。因此,妥善协调社会资本与村民的关系,是解决困局的关键。

对浙江、四川、云南等地调研后发现,政府只有重视生态产品价值为谁实现、归谁建设、由谁治理等问题,在公有制基础上,以集体经济主导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激励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以公平生态收益分配制度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充分共享,探索生态产品价值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才能在生态产品生产与价值实现过程中保证村民利益,增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村绿色共富的带动能力,实现乡村绿色振兴。

(一)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主导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

长期以来,资本短缺、资源整合水平低、集体行动能力弱严重阻碍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虽然引入社会资本有助于弥补上述不足,但若对社会资本缺乏恰当规范与引导,村民权益将被社会资本架空,使得乡村生态保护体系与民生保障体系均面临较大系统性风险。为此,乡村需要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并坚持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主导,通过提升自主经营水平、鼓励跨村联合经营、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等方式,整合生态资源,弥补经济资源短板,使得村民能够充分参与生态产业建设过程中,把握生态产品生产经营主动权,将社会资本转变为可借助的外力,从而高效共建集体公共池塘资源,推动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保障村民权益。

所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以农民为主体,相关利益方通过联合与合作,形成的具有明晰的产权关系、清晰的成员边界、合理的治理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实行平等协商、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经济形态^[32]。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代表村民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能够重塑村民与社会资本合作关系,从而增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乡村绿色共富带动能力,表现为如下 3 个方面:首先,提升自主经营水平。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能够依托村级集体推进农村生态资产产权流转,通过资源整合、人才回乡、乡贤投资等方式,激活各类集体资源资产,引导农户抱团合作发展,提高生态产品生产经营规模效率。也能够提升成员利益共融水平,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巩固强化村民在生态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第二,鼓励跨村联合经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有助于遵循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律,打破传统行政区划限制,推动资源跨村规划整合,建设生态资源跨村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新模式,克服单村发展中面临的集体资源资产有限的短板,提升生态资源利用效率与价值实现水平;第三,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调节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产经营水平。对于内部资源匮乏的乡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缺乏自主经营能力,主要借助态资源整体流转的规模优势,最大限度为村民主张权益。对于内部资源相对丰裕的乡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掌握自然资源经营管理权,主要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形式,补齐生态产品生产经营短板,增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绿色共富的带动能力。

(二)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激励乡村生态环境治理

良好的生态本底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需要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劳动加以维护。但由于生态产品具有较强公共属性与正外部性,相应劳动价值较难通过商品化市场途径实现,过度依靠有限的公共财政,会导致生态产品供给往往处于较低水平。为此,乡村需要以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导向、以生态保护修复为目的,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推动乡村治理全过程民主,提高村集体内部的协同共治水平,使得生态环境治理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改善人力物力投入精准性与高效性,实现生态环境治理成本集约化、效益最大化,提高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修复成效。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

谛”^[33]。乡村地区用全过程人民民主激励村民主动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组织发动村民自主开展恢复自然生产力行动,提高村民自主贡献人财物力的积极性,提升村集体内部协同共治水平。一方面,以强村公司或合作社形式,统筹开发资源,使得村民能够参与生态资源规划开发全过程,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人力物力成本内部化,促使个体成本和收益向社会成本和收益充分收敛,增强生态本底保护修复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以党建为引领,发挥党员志愿者、乡贤等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村民自主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协同共治。倡导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调动广大群众主动贡献人财物力的积极性,使得生态产品生产摆脱对公共财政外生驱动的依赖,促进环境治理成本与效益实现内循环,实现生态产品的充分供给,能够满足维持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并通过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增强乡村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承载能力,提升村民身心健康水平,促进乡村整体福祉改善,保障村民生存繁衍根本权益。

(三)以生态收益公平分配制度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充分共享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市场调节机制对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显得尤为关键。实践多关注生态产品价值货币形态实现,目的是激励生态环境保护内生动力。然而,囿于生态收益分配制度尚不完善,制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内生动力的增强。一方面,生态产业风险较高,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生态产品公共属性较强,其大部分价值很难私有化,为资本逐利设置了天然屏障,导致生态产业发展的资本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较为强势,将农民“边缘化”,村民只能获得土地流转和务工收入,很难获得土地溢价与经营收入分红,村民增收较为有限。为此,乡村需要重视构建公平的生态收益分配制度,既要使得社会资本投入获得合理回报,也要促进村民增收,使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充分共享。

共享的基本内涵就是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

果,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乡村地区应重视构建公平的生态收益分配制度,合理分配生态产业收益,保障村民利益,让生态投入得到合理回报,从而调动各界参与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积极性。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组织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其自有资金、物资、技术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入股生态产品经营主体成为股东,采取保底收益、务工收益、分红收益等方式,积极推动土地流转保增收、劳务扶贫稳增收、入股分红促增收、集体分配强增收,同时也保障社会资本投入获得合理回报;另一方面,以股权为纽带建立集体经济区域联合体,全面开展村社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造,推动农民变股东,形成以股权本位市场化运作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进而提升村民在生态产业发展中主体地位,将社会资本转变为可借助的外力。村民不再被组合替代,而是主动作为,逐渐把握生态产品生产经营主动权,从而极大提升生产资料自主经营水平,充分发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初次分配层面对绿色共富带动能力,减少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促进绿色共富的财政压力和政策强迫感,将经营收益以间接或直接方式回馈村民,保障村民发展权与收益权。

五、结语

绿色共富是在绿色发展理念下,由共同富裕衍生而来。在此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旨趣由生产消费端向收益公平分配转变。只有结合超大宏观、宏中观以及微观三大视域尺度,辩证生态产品公共属性及其价值实现形式,才能正确认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政策实践经历保值增值、价值转化、价值公平共享等阶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不断与区域协同发展、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有机融合,显现出绿色共富演变取向。生态产品价值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只有保护个体利益,保障社会资本合理收益,兼顾集体福祉,防止“搭便车”式坐享其

成,促进收益公平分配,才能使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个体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充分收敛,从而增强公众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极性,为绿色共富目标实现构建有效的保障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借助农村规模庞大的自然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潜力,扎实推进乡村绿色共富,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绿色共富视角下,各界应积极探索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共建共享共治实践路径,在集体经济主导下,通过扩大生态产品生产,使得村民把握生态产品生产经营主动权;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通过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生态治理积极性;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通过公平分配经济收益,调动各界参与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积极性,进而以绿色发展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 [1] 庄贵阳,王思博. 正确认识生态产品公共属性 有序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N]. 四川日报,2022-08-22(10).
- [2] 欧阳志云,朱春全,杨广斌,等.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概念、核算方法与案例研究[J]. 生态学报,2013,33(21):6747-6761.
- [3] 於方,杨威杉,马国霞,等. 生态价值核算的国内外最新进展与展望[J]. 环境保护,2020,48(14):18-24.
- [4] 林智钦. 新时代背景下绿色生态的内涵意涵和战略构想[J]. 中国软科学,2022(S1):25-33.
- [5] 张林波,虞慧怡,郝超志,等. 生态产品概念再定义及其内涵辨析[J]. 环境科学研究,2021,34(3):655-660.
- [6] 马晓妍,何仁伟,洪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析: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新时代拓展[J]. 学习与实践,2020(3):28-35.
- [7] 龚勤林,陈说. 基于资本循环理论的区域优势转化与生态财富形成研究:兼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12(2):97-118.
- [8] 白暴力,程艳敏,白瑞雪. 发展生态经济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研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J]. 上海经济研究,2022(12):5-16,124.
- [9] 沈满洪.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共同富裕观[J]. 治理研究,2021,37(5):5-13.
- [10] 王结发. 绿色共富论[J]. 青海社会科学,2022(5):

107-114.

[11]杜焱强,王继应,孙雪峰.“生态颜值”何以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10):150-159.

[12]陈少强,覃凤琴.财政生态补偿:一个理论逻辑[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11):17-25.

[13]吴振磊,康颜钰,王泽润.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减贫的启示[J].学习与探索,2022(3):107-116.

[14]胡振通,王亚华.中国生态扶贫的理论创新和实现机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6(1):168-180,206.

[15]张云飞.我国生态反贫困的探索和经验[J].城市与环境研究,2021(2):65-81.

[1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17]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2021,56(11):4-13.

[18]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37(8):117-129.

[19]陈惠雄.共同富裕的自然尺度与空间维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7-20(3).

[20]刘尚希.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17-18.

[21]杨瑞龙.中国微观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的构建[J].经济学动态,2023,746(4):3-12.

[22]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EB/OL].(2010-12-11)[2023-05-23].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1-06/08/content_1441.htm.

[23]黄成,吴传清.主体功能区制度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9(11):166-175.

[24]李昆,魏晓平.产品系统生态化的“现实性要求”及政策诱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4):153-157.

[2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EB/OL].(2017-10-12)[2023-05-23].http://www.hnzcpr.cn/page158?article_id=276.

[2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EB/OL].(2019-04-14)[2023-05-23].http://www.gov.cn/zhengce/2019-04/14/content_5382818.htm.

[2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EB/OL].(2019-04-15)[2023-05-23].http://www.gov.cn/xinwen/2019-05/05/content_5388880.htm.

[2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EB/OL].(2023-01-19)[2023-05-23].<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35706/1735706.htm>.

[2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EB/OL].(2021-04-26)[2023-05-23].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09079.htm.

[3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EB/OL].(2021-09-12)[2023-05-23].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12/content_5636905.htm.

[31]国家发改委.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EB/OL].(2019-03-13)[2023-05-23].http://szy.mwr.gov.cn/zl/sqzd/201903/t20190313_1110545.html.

[32]魏建.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3):13-22.

[3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2023-05-23].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本文责编:润 泽)